

JINDAI SHEHUI ZHUANXING ZHONG DE GUOSHU 牛爱军 著

转型中的国术

近代社会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 之二

WUSHU WENHUA YANJIU CONGJI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

《中国武术百年转型历程的时代语境与宏观特征研究》阶段性成果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之二

近代社会转型 中的国术

牛爱军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国术 / 牛爱军著. -北京: 人民
体育出版社, 2014

(武术文化研究丛集; 2)

ISBN 978-7-5009-4676-2

I. ①近… II. ①牛… III. ①武术-体育运动史-
中国-近代 IV. ①G85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6423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32 开本 5.25 印张 12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

ISBN 978-7-5009-4676-2

定价: 20.00 元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8 号 (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 67151482 (发行部) 邮编: 10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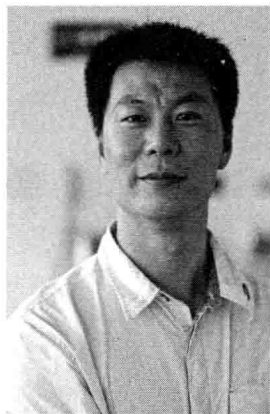
传真: 67151483 邮购: 67118491

(购买本社图书,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



作者简介

牛爱军，山东新泰人，九三学社社员，山东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上海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沈阳工业大学体育部、广州体育学院武术系工作，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目前就职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学位论文《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研究生论文（博士层次），2010年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曾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主持和负责了多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研究，曾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在《中国体育科技》《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刊》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中国武术传承研究》，参与编写国家级教材《中国传统体育养生学》《传统体育养生教程》《中国武术通用教程》等多部，多篇论文被第29届奥运会科学大会、第16届亚运会科学大会、第8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第2届中国博士后体育论坛、全国武术论文报告会等录用。



前言

具体的历史事件自然不可能重演，但是某些历史的精神，即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却可以不断持续地重演，直到它能自觉地进行一场理性的自我批判为止。观照近代以来围绕武术所发生的很多事件，再对照当下人们对武术的种种认知，两者之间颇有可通之处、可评之说。历史一成不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能不断创新，但是怎样才能不先入为主地理解和鉴别这种“历史的真实”却又是如此的可贵和困难。

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研究者应该借助多种类型的史料，力求客观——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客观，但至少要力求，杜绝不求客观甚或“创造历史”——再现事件的主要实相，并调动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主动而有节制地诠释其“内外意义”。同时，研究者还应该自觉呈现事件中的多种竞争性声音、观念、彼此博弈的动态过程，以及该事件最终结局的社会成因分析和文化反思。

“体育文化”及体育所涵各项目之文化如“武术文化”等早已成为显学，且其研究并不局限在单独的体育门类内，而是具有多门类的跨越性。对于具体事件，如《断魂枪》、如“新武术”、如“精武会”，往往蕴藏着值得深究回味的独特的“文化史意义”，这种意义的彰显，很可能需要后来学者的反思性参与，才可能得以构成中国近现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础部分。



历史细节上的“祛魅”不应当遮蔽我们对“大局”或曰“宏大叙事”的观察，理解历史事件、了解历史人物、剖析事件背景都离不开对大局的认知，但“叙事”太“宏大”、太迁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往往会导致“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千人一面”，甚至干脆消失。

大多数具有群体凝聚力的集体记忆是创伤性的，而共同情感则是群体记忆的凝聚力所在。对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来说，集体记忆首先是在课堂里形成的，源于学校教育；有关武术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渠道，影视、小说等艺术化创造途径。武术的功利化、情绪化使武术仿佛具备了神奇的功效，可以强种、可以救国，被套上了很多耀眼的光环，成为国人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的一个鲜明象征。

近代以来，人们引科技、知识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的进步为傲，如今却日益认识到人类控制自然和人性的能力虽然日渐强大，但这种能力往往只是工具，更有效地进行着对人的侵略、剥削、压迫和对大自然的掠夺，进步并没有带来与物质上的繁荣可相媲美的人性和文明在道德意义及精神上的提升。在某些研究者的眼中，武术是提高道德水准和精神追求的工具，武术被贴上了工具的标签，可以陶冶性格、可以对抗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影响，“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四书五经、礼乐射御都没办法的事，又怎能期待武术有这能耐？

借《易经》的说法，史学研究首先要“彰往”，不能使人类的往昔湮没；其次要“藏往”，维持人类的历史记忆；然后还要“察来”，知道人类怎样才可以比过去更好。研究之有用，亦在于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对本研究的几点说明	(1)
一、关于“国术”与“武术”	(2)
二、关于“近代”	(4)
三、关于“近代社会转型”	(5)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7)
一、研究动机	(8)
二、研究目的	(16)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17)
一、研究内容	(17)
二、研究方法	(21)
第二章 身体与规训	
——国术救国的努力	(22)
第一节 身体与国术	(22)
一、身体：尚武与尚争	(23)
二、国术：强种与救国	(29)
第二节 精武会与改造国民	(34)
一、规训国民	(35)



二、从“体操”到“体育”	(40)	
第三节 小结	(44)	
第三章 民族性与艺术性		
——从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的国术表演谈起		
.....	(46)	
第一节 国族意识的勃兴	(46)	
一、国术与民族主义	(46)	
二、土洋体育之争	(49)	
三、“武术进奥”的尴尬	(56)	
第二节 “艺术性”是国术的生命力	(58)	
一、国术具有艺术与奋斗及舞蹈之三大特点		
.....	(58)	
二、套路演练是对真实打斗的超越	(61)	
第三节 小结	(64)	
第四章 裂变与传承		
——从《断魂枪》说起		(67)
第一节 因不变而不传	(67)	
一、国术逐步“祛神秘化”	(68)	
二、“共命同尽”与“变以图存”	(69)	
第二节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	(71)	
一、“家庭”的弱化	(72)	
二、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家庭走向学校	(75)	
三、武术的传承	(79)	



第三节 小结	(83)
第五章 回应新变	
——以《中华新武术》为例	(85)
第一节 在“现代”中保持传统	(86)
一、诠释古典，回应新变	(86)
二、保护遗产，保留武术文化	(90)
三、作为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武术	(92)
四、武术的文化自觉	(98)
第二节 以变应变	(99)
一、学习“兵操”，转向体育	(99)
二、“统一”国术，注重健身	(103)
三、“以变应变”是武术发展的永恒主题	(109)
第三节 小结	(112)
第六章 失范与建构	(116)
第一节 我注六经，抑或六经注我 ——对武术史学研究的反思	(116)
一、“国术”在武术史上的地位	(118)
二、对《中华新武术》的再评价	(121)
三、思想史与武术史的互动	(127)
第二节 构建“学界”的努力与失落	(128)
一、科学化与科学精神	(129)



二、构建“国术学界”	(133)
三、武术文化研究的失范	(135)
第三节 小结	(147)
第七章 结语	(148)
参考文献	(150)





第一章 绪论

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构造“中国的现代性”。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被世人等同于“现代性”，而事实上，世界各国（特别是非西方国家）都在努力寻求建设具有本国家、本民族特质的现代性，今日世界在 21 世纪应该也很可能会出现“多元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努力首先是从文化与教育开始的，近代以来一系列的变革颠覆了中国两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在重新崛起或者说是重构这个文明秩序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调适、再生、扬弃等问题始终相伴在中国人的左右。考察近代以来的国术，可以从这一滴水中折射出全局的变迁。

第一节 对本研究的几点说明

本节主要对“国术”与“武术”的概念、所涉及年代的界定和所谓“近代社会转型”进行说明。实际上，“国术”比“武术”更具有表述中国思想的强度，也更彰显了近代开明之士意图通过确定概念来突出“文化财产权利”的努力。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或者命名者往往具有很大优势，德国人把它叫作





“Deutungshoheit”，意思是拥有给思想定义的主权^①。当然这种努力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近代）和当时国家社会所面临的处境（转型）。

一、关于“国术”与“武术”

在本研究中，“国术”与“武术”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仅存在称呼上的差异。

“国术”与“武术”这两个词是长期通用的，即使是在“国术”被大力提倡的阶段，“武术”一词也并未消亡。比如1928年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提出《请提倡我国固有武术案》、1931年“上海市武术学社”成立等；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统一“国术”名称为“武术”，但仍有人以“国术”指代武术^②。

“国术”一词正式取代“武术”并得到官方认可和推介的经过如下所述：

1926年12月，国术（武术）主要倡导者和奠基者张之江，与李景林、钮惕生在南京共同创建“武术研究所”，并向政府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他认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国宝，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在获得政府批准后将“武术研究所”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3月15日，“国术研究馆”获准由《国民政府公报》第41期刊载“第174号令”公文批准备案，全称“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研究

① 裴德思. 怎么翻译中华文明的核心词 [N]. 南方周末, 2013-06-06 (31).

② 杨祥全, 杨向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 [M]. 台北: 台湾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 2009: 1.



馆”，简称“央馆”。1928年6月，“国术研究馆”正式易名为“中央国术馆”，它是中华民国时期主管国术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属国民政府直属机构，经费由财政部国库开支。1929年2月中央国术馆颁布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推广国术教学，培养武术人才；研究整理中国国术与体育；编辑出版国术及其他武术书刊；制定各项规则及组织大纲，管理全国国术事宜^①。

把武术的地位从民间技艺提升到作为“国粹、国宝”的“一国之术”：国术，这种称呼比起“武术”来多了一层感情色彩和寄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本研究将围绕与国术有关的一些事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解读，力图透过表面发现时代变动的履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时期各种不同的教育、体育会议上，形成并通过了个人或团体提出的很多有关“国术”的议决案，如1915—1926年间的《推广中华新武术案》《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1918—1919年间的《请将中国固有武术加入专门学科案》《拟请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案》；1922—1925年间的《小学校自初级三年起体育一科应加授国技案》、1940年的《发展国术，以普及国民体育案》和《国民体育应切实推行我国固有之射术、拳术、摔角、跳远、举重案》等等。

不管是“武术”“新武术”“固有武术”，还是“国技”“国术”，它都指向同一种事物。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称呼，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武术概念^②，随着行

①孙文鼐. 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 [J]. 江苏地方志, 2008 (4): 80.

②温力. 中国武术概论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21.



政命令的介入，这些称呼才渐渐统一为“国术”。1954年以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陆把“国术”改称为“武术”，但“国术”这一称谓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社会中也一直得以保留和发展。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港、澳、台及海外所指的“国术”范围比目前大陆体育学界对“武术”的概括更广泛一些：主要包括踢、打、摔、拿等技击方法，套路，以及骑射等传统武艺内容。由于目前体育学界对“武术”的概念、性质、功能等的认识歧见纷呈，并不统一，所以本文对“武术”的理解只能取其大概，对“国术”和“武术”所涵盖的范围也就笼统而论，认为基本是可以通用的。

本文标题之所以弃武术而用国术，主要目的是为了凸显时代特征。本文中的“国术”“武术”时有混用，只是出于行文的方便，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作者有意识的区分和实质意义上的不同。

二、关于“近代”

本研究所指的近代为1840—1940年，1840年作为研究的上限，1940年作为下限。这种选择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将1840年视为我国近代的开始，这是学界沿用已久的时间界定。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但使中国遭遇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危机，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整体性的应对外来挑战的生存危机中，由此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被动态势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所以1840年是富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

虽然我国使用火器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从1840年到1940年，火器并没有在军事上占据绝对性的统治地位，特别



是在非军事人员中，以及军事装备较差的一些时期和地域，以国术为代表的搏斗技艺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据 1978 年出版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记载，广州三元里一带的乡民素有习武传统，抗英斗争中的英雄人物也都身怀高超武艺。抗日战争中十九路军大刀队的事迹，同样说明国术即使在现代化的战争中也不能或缺。

其次，从 1840 年开始，国术开始逐步脱离农耕文明的产生土壤，在与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进行变革。从国术的角度来考察这场变革，回顾“冲击反应（回应）”论、“中国中心”论和“外因内因结合”论等不同观点，反思国术在其中充当的角色，这既能丰富国术自身的研究视野和文化内涵，又提供了考察近代社会的不同视角，体现了对“全面的历史”或“整体的历史”的追求。

只选择这一百余年进行研究，是因为这段时期国家处于动荡状态，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一直是整个社会的向往，国术成为民众心理上的一个象征，被赋予了超越“体育”（身体教育、身体训练或者运动竞赛）的职能。

虽然本研究所引用的资料和所论述的现象，主要集中在 1900 年以后，但这并不能掩盖 1840 年以来社会变化的趋向，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发生的事物变化规律同样适合研究有关国术的社会现象。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近代为 1840—1940 年。

三、关于“近代社会转型”

研究社会转型，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用历史视野，但首先要面对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什么？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①。

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②。近代社会转型把转型的这段过程限定在了“近代”。

“近代”不仅具有时间含义，还被后世学者赋予了与“近代性”有关的丰富含义。“近代性”议题往往与“西学东渐”的议题息息相关。近代史学者在讨论“近代性”时，经常集中在个别人物的思想和论著，或清朝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面，因而不免漠视了民间日常用品或偶一尝试的发明所呈现的细微变化，忽略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延续与创新，忽略了许多无心插柳的技术模仿为后来刻意追求西学或新学所奠定的基础。总之，重精英，重思想；轻庶民，轻实物^{③④}。

转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也是社会科学对历史感兴

①郑杭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11

②郑杭生, 李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9.

③程美宝. 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J]. 历史研究, 2001 (1): 127.

④程美宝. 从思想史到思想家的历史——评麦哲维《学海: 十九世纪广州的社会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J]. 清史研究, 2007 (2): 126.



趣的原因之一。在1980年以前,虽然学者们多意识到“个人”与“社会”(或事件与结构)间的纠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大主题,然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仍是社会、文化。无论是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或是象征人类学,探索的皆是社会或文化整体的制度功能、内在结构、社会赋予某一物或事物的象征意义、文化中蕴藏的人观等等。可以说,所有的这些理论皆容不下“个人”及“事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比较稳定的、整体的社会文化图像^①。所以这样的研究倾向很难对社会转型过程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现在个人和事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就是希望能够从其中寻找到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常面对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对立的途径:社会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种种制度、结构、规范之集结,另一方面又在许多个人的主观意志、利益抉择与作为下延续、变迁。

所以,本文希望能够通过捡拾有关国术的点滴,从民众的生活中汲取借鉴和思考,形成与当时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的互动,再透过国术这面镜子,折射出近代社会转型中一些容易被忽略但还是很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和思想。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941年法国作家 Claude-Ed-monde-Magny 这样评论过文学批评的困境^②:“文学批评自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开始,就一直被囚禁在一种两难之境中,它要么只是就研究对

①王明珂.许多个人如何构成社会 [N].南方周末,2011-05-12 (26).

②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 [N].南方周末,2013-07-18 (24).